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劫后反思】	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高文谦
【学术探讨】	文革“语录崇拜”背后的逻辑与法理	王 毅
【读史笔记】	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四）	钱理群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劫后反思】

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 高文谦 •

◇ 邓小平应对毛文革遗产复活负责

毛泽东是中国人的宿命和孽债，生前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命运，改变了近代中国原有的历史走向，把整个国家推入一场共产主义乌托邦试验场。尽管他已经死去多年，但幽灵仍在缠绕着中国，牵制着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而文革则是毛留给中国最大的政治遗产，一直蛰伏在朝野人心之中，时隐时现，挥之不去，左右着当今中共最高执政者的思维方式、执政模式、话语风格和路径选择。

毛泽东发动文革，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政治生涯中一场最大的赌博，乃至一生的归宿。文革倾注了毛一生的心血，浓缩了他全部的政治理念，是他对中共建政后党内分歧、历史恩怨所做的一次总的清算。他自以为可以指点江山，再造历史，变共产党的党天下为毛氏的家天下，最后却被历史所捉弄，败于党内官僚集团。死后不到一个月，江青就被囚禁，精心安排的由文革派接班的布局灰飞烟灭。毛晚年背诵《枯树赋》的悲凉心境，正是对这种结局的预感。

毛的文革遗产与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一对孪生兄弟，前者是后者的极端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常态表现，两者同源，互为依存，剪不断理还乱。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就存在着“文革基因”，其核心是敌对思维和斗争哲学，制造仇恨，崇尚暴力。毛的文革遗产当年经过文革秀才的包装后，具有相当完备的理论形态，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概括出性质、矛盾、对象、动力、途径等六个方面的要点。本来，这只是文革秀才为毛发动文革寻找说辞的理论包装和欺骗愚弄民众的政治宣传，后来却成为中共官方为毛遮羞的依据，用所谓的“理想主义”来掩盖毛的文革罪责。在讨论毛的文革遗产时，应该特别小心，不要落入官方的这种话语陷阱之中。

文革浩劫后，人们痛定思痛，本来可以趁势一举彻底清算毛的罪责，从起草官方历史问题决议前召开的四千人讨论会上群起批毛的气氛，就可以看出当时党内外的人心向背。记得当时听传达，万里在书记处会议上讲，现在是最后一次再提“毛泽东思想”。但是，邓小平扼杀了这一批毛的势头，强调毛功大于过，必须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否则，决议宁可不写！

按照邓定下的调子，当时理论权威胡乔木煞费苦心，试图把毛的晚年错误即文革遗产从官方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来，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晚年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毛被高高挂起，让林彪、江青背文革的黑锅，中共官方提出的“彻底否定文革”轰轰烈烈地走了过场，成了烂尾工程，贻害深远。

邓小平刻意维护毛，从私心来说，是不想当中国的赫鲁晓夫，但从政治上来说则是为了保住党天下，不想触动文革产生的制度根源。邓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只在某种程度上与毛划清界限，以此为基础推动改革开放，开创自己的时代。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缺少政治胆识和历史眼光来开创国家真正的长治久安。

其实，邓心里很清楚，对毛的评价禁不住历史的检验。九十年代初，邓向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等人承认，当年决议“部分历史是不实的”，对毛的评价是“违心的”，可以在他们这一代走后，再作全面评价。但是，已经坐失清算毛的历史时机，以致造成今天毛文革遗产死灰复燃，困扰中国的局面。应该说，邓对此起了关键作用，应负的历史责任一点不比六四镇压小。

◇ 邓与毛的历史渊源左右其改革取向

在邓小平时代，中共官方对毛文革错误的定性，是按照《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口径，指毛犯有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并推向极端，但没有认真加以清理，而是强调“宜粗不宜细”，文革历史的真相被刻意掩盖起来。

“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离开了历史细节，一般民众无从了解毛发动文革的真相和罪责。再加上毛的文革遗产与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同质性，掰扯不清，结果八十年代官方的否定文革做成一锅抽象否定、具体含混的夹生饭。

另一方面，邓小平主政后实行的跛脚鸭式的改革，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公和民怨，这成为毛的文革遗产复活、兴风作浪的社会土壤。不错，邓主导的改革开放把中国民众从毛时代的贫穷饥饿中解救出来，开始过上小康生活，但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民众的福祉，而是为了挽救共产党的一党天下。这是八十年代的改革步履蹒跚，一波三折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不能容忍胡耀邦、赵紫阳，接连罢黜两任总书记的原因所在。与胡、赵两人相比，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派，充其量只是个半吊子的改革派。更深一步说，邓的改革取向，与毛对他有知遇之恩有密切关系，这种情结左右着他的政治判断。

在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中，邓小平与毛的关系最深。早在中央苏区毛挨整时，邓就是毛派的头子而受到株连，由此得到毛的青睐，刻意扶植，作为接班人来培养，锋头甚至超过林彪。如在淮海战役中，让邓统领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在中共八大时，又先林彪一步进入中央常委。中共建政后，邓一度也是积极贯彻毛的左倾路线的得力干将，在许多事情上，邓都难脱干系，如在反右运动中担任前台总指挥；在中苏论战中，邓直接领导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参加这个写作班子的康生、王力等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渊源，毛虽然对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跑不满，在文革中想整他一下，但始终留有余地，强调“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并给予特别关照，允许邓可以给他写信，指定汪东兴负责照顾邓的生活。所以邓在文革中的境遇，与刘少奇、彭德怀那种生不如死的境遇有完全不同。即便是邓在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后，毛仍保留他的党籍，并满足邓的请求，允许他和家人在一起，可谓做到“仁至义尽”。

◇ “中国模式”：邓思想和毛体制杂交怪胎

邓、毛之间这种关系，使邓小平对发动文革的历史罪人毛泽东格外宽容，高高挂起，轻轻放过。在维护毛的问题上，他甚至超过党内保守派大老陈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才是中共党内最大的保守派。这种对毛的暧昧态度，对一党体制的格外看重，决定了邓在政治上的摇摆性，一身兼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双重角色，只求经济发展，拒绝政治改革。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催生了“中国模式”的权贵资本主义。

这种半管制、半市场的权力经济——通过权力寻租，通过市场兑现，是中共官场乃至整个社会深陷腐败、道德沦丧的原因。邓小平是始作俑者。邓是一个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门槛上半新半旧的人物，他一手催生了改革的胎儿，一手又掐死了改革的生机。缺少了政治改革的制衡，一党体制下的经济改革所释放出来的人和资本的贪婪，必然像当年毛煽动文革狂热一样席卷肆虐整个社会。

六四镇压后，当邓小平在耄耋之年，终于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写入中共十四大党章的那一刻，就为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打开大门。此后，所谓“改革”已经成为权贵集团的专利，造成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失衡，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广大底层民众沦为改革的牺牲品。

于是，人们开始怀念毛时代的“公平清廉”，把毛看作是反抗社会不公和权贵集团贪腐的旗帜，是人民的保护神。毛的文革遗产更是成为中共党内原教旨派批判邓式改革的利器，社会被严重撕裂，毛左和邓右两种势力水火不相容。这种局面是生前刻意维护毛历史地位的邓小平始料不及的。毛的文革和邓的片面改革，一左一右，共同释放出来的人性恶，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生态环境和道德伦理底线，而这正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必须面对的局面。

◇ 毛的文革遗产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

毛的文革遗产究竟是什么，应如何界定？目前学术界有各种说法，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做出解读，五花八门，见仁见智。我不想介入各种观点的争论，因为这对整体把握毛文革遗产的实质并没有多少帮助，更不想陷入中共官方的话语陷阱。这里，只想从宏观上加以界定：毛的文革遗产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极端表现形式，其理论形态是所谓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学说；文革的真实目标是夺权和清洗，换上忠于毛路线的人，最终建立毛氏家天下；文革理论和实践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的。

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人物，是列宁式极权体制、中国皇权专制传统、中国底层流氓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原有的走向。中共官方史学用“革命史范式”解释中国近代历史，把它说成是“两个过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共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过程。但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视野里来看，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表象之谈。

近代中国的百年激荡史，实际上是世界全球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被动卷入其中，目前这一过程仍未结束，还在继续扩张深化。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毛是中国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失落、抵触、挣扎、反抗、一再挫败，最后选择激进变革，以俄为师，走上共产极权道路的人格化符号。毛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试验，开启了一个狂热和恐怖的年代。

◇ 毛发动文革与“理想主义”无关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肇端是急于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狂想。斯大林死后，触发了毛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欲望，改变了原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间表，大幅加快对各行各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约定“超英赶美”后，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刮“共产风”，结果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

闯下大祸后，毛拒绝认错，在庐山会议上整肃直言谏诤的彭德怀，从此心魔缠身，自觉在党内日益孤立，大权旁落，更担心自己身后被人清算，落得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他认定刘少奇就是准备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的人。于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魔咒驱使着毛像唐·吉珂德一样大战风车，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之路。由于刘少奇在党内的势力已经坐大，声望日高，通过正常途径已经难以铲除，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发动文革，就是毛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

这里之所以概述文革的历史成因，就是不想在讨论毛的文革遗产时，堕入中共官方史学的话语陷阱，把毛发动文革的动机说成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等，用“理想主义”的锦被掩盖毛的真实动机。

◇ 文革：毛个人意志与极权体制结合的怪胎

毛一生嗜权如命，文革十年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史，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确保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要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掌握在毛及其亲信手里的委婉说法。事实上，毛发动文革非但与“理想主义”无关，反而是出于“宁可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先是急于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发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又怕被人清算，于是先发制人，发动文革，把整个国家拖入历时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

顺便一提的是，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极权体制是产生文革的根本原因。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把主次颠倒了。不错，一党极权体制是毛发动文革的制度平台，但与毛的个人意志相比，是次要因素。试问，同是在中国的一党体制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发动文革吗？同样，前苏联东欧也是一党极权国家，他们那里发生过历时十年之久的毛式文革吗？所以更确切地说，文革带有毛强烈的个人印记，是毛的个人意志与中国一党极权体制结合而产生的怪胎。

◇ 毛“人民情结”的背后是要做“千古一帝”

在清理毛的文革遗产时，除了所谓“理想主义”的问题外，毛还有另一个迷惑人之处——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也有必要加以分析。这种说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非常虚伪。毛发动文革开的是夫妻店，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由文革派接掌最高领导权，确保自己身后不被清算，人民群众不过是他手中利用的工具。事实上，毛从来不以苍生为念，饿死

几千万人，拒绝下罪己诏；还向赫鲁晓夫说大话：不怕打核大战，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三亿。

文革中，毛把群众玩弄于股掌之上，鼓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为他火中取栗。文革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中央文革秉承毛的旨意操弄群众的那只手，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把火烧向刘少奇，冲垮党内反对势力。为了政治需要，毛在文革中曾多次变脸，对红卫兵、造反派始用终弃，一脚踢开。

毛这样翻云覆雨，原因在于他刻意表现的“人民情结”和内心深处的“帝王情结”这两个角色的内在冲突：一方面，他故作代表底层民众的姿态，号召他们起来造体制的反；另一方面毛本人就是一党体制的缔造者和官僚集团“最大的官”，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毛虽然对党内官僚集团不满，试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那不过是“帝王情结”在作祟，嫌官僚集团妨碍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古一帝”，因为共产党的江山毕竟姓党，而不姓毛。毛扶植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建立家天下的企图受到党内官僚集团的强烈抵制，最后不得不妥协，牺牲奉旨造反的民众，回归一党官僚体制，来换取官僚集团默认事实上的毛家天下——由文革派在毛身后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就是文革实际走过的轨迹。

毛的文革遗产的基本特征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的，深得马克思、列宁暴力革命学说的精髓，同时又带有毛鲜明的个性特征。文革中，毛那些充斥阶级斗争、鼓吹暴力、煽动仇恨和斗争哲学的语录成为最高指示，风靡全国，诸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乃至“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等等。在毛歪理邪说的蛊惑挑唆下，整个中国一片红色恐怖，成了人间地狱，顺毛者昌，逆毛者亡。在“革命”的名义下，人命如草芥，揪斗批判，游街示众，私设牢房，血腥杀戮，冤狱遍于国中，上演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 文革最大的罪恶：泯灭人性，释放兽性

文革浩劫对中华民族精神、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摧毁，更是危害深远。毛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以历史上的专制暴君自喻，不仅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帝王情结”，而且也可以看出文革与焚书坑儒一脉相承的关系；至于马克思学说，本来就是人类文明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时因运而生却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乌托邦空想。毛的文革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思想发展到极致，乃至到了反人类文明的地步，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价值观，对中华文明的毁灭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文革期间，中华文明遭遇了一场旷古劫难，整个人文精神体系崩溃，只剩下一个大脑和八个样板戏。文革理念与现代文明更是背道而驰，与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水火不相容。

文革中，中外一切文化传统通通被斥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封资修”，大张挞伐，就连西洋古典音乐也不放过，自己老祖宗的文化传统更是在劫难逃，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传统的核心儒家文化。文革初期，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砸孔庙，烧典籍文物，毁历史古迹；毛后来还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掘地三尺，把孔圣人拉出来鞭尸。毛如此对待孔子，除了有政治上的需要外，根子在于内心深处的反传统情结和底层流氓文化意识。毛读私塾时，就曾干过砸孔子牌位的事。毛的这种反儒倾向经过五四运动后更加强烈，文革就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次总清算。人们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其实，文革才是真正的“崖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的“种族灭绝”。

毛的文革遗产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反人类的，摧毁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是非善恶标准与人性道德底线。可以说，文革最大的罪恶在于泯灭人性，释放出兽性，其中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精神的虐杀，对肉体的残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广西甚至发生吃人的现象。在文革那个狂热的年代，只要是反对毛，就是阶级敌人，就不是人，可以做出任何灭绝人性的事情。父子相残、夫妻反目、亲友揭发、家人背叛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不是个人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人性沦丧。文革对中国人的伤害，莫此为甚。只有彻底摒弃毛的文革遗产，全民族认真进行反省忏悔，才能使人性复苏，重建中华文明。

◇ 毛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

以习近平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红二代治国的时代。红二代普遍对江泽民、胡锦涛两代治下的社会现状不满。习上台之初，红二代曾举行规模空前的聚会，为其呐喊造势。在讨论毛的文革遗产对习近平执政环境、治国思路 and 模式的影响之前，不妨先来看一下红二代群体的构成、成长环境、政治取向等，这会有助于理解习近平上台后的所作所为。

红二代是近几年蹿红的词汇，与官二代、富二代相对应，取代了以往的太子党、高干子弟一类的说法。首先，从构成上看，指的是父辈曾投身中共革命，参与创建红色江山；其次，从年龄看，大体是40后到60后，以文革前的老三届为主体。可以说，红二代是“红旗下的蛋”，或者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划分，实际的情况可能有所出入。

◇ 红二代内部等级森严

红二代内部等级森严，分三六九等，呈金字塔形，各有各的圈子。最上面的是中共开国元勋、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其次是中共建政时，父辈职务是地方省部级以上或军队受衔时少将以上的子女——这两类是响当当的红二代，屡出风头的将军后代合唱团就是这些人，他们是红二代的核心圈子和头面人物；再往下是中共官场中属于高干级别（行政十三级以上）的子女；底层是中共建政前参加革命的子女。后面这两部分占红二代的绝大多数，其中分得改革红利一杯羹的不多，多数只是小康之家，与普通民众无异。

中共建政后，革命开始吞噬自己的儿女，文革中大批共产党干部更是在劫难逃，红二代中一部分人的命运由此发生重大改变，沦为政治贱民，由红色贵族变成“黑帮子女”和“狗崽子”。习近平就是文革前家庭遭遇变故的红二代。这里，需要注意文革前后的区别，这对理解习的性格为人很重要。由于文革前政治运动的波及面相对小一些，挨整的人及其家庭处境孤立，更容易被人歧视，同时这些子女年龄相对较小，正是性格形成的时候。习近平在其父落难时，只有九岁，严酷的环境直接影响到性格的形成，更善于隐忍韬晦，深藏不露，这是他与薄熙来的张狂跋扈不一样的地方。原因在于薄一波在文革中倒台的时候，薄熙来是高中生，性格已经定型，虽然他当狗崽子时也要靠隐忍生存，但一旦环境改变，以往张狂的性格就会旧态复萌。

◇ 文革是红二代的青春情结

尽管红二代们后来各自的命运经历大不相同，但他们成长的环境是相同的，是喝党文化的狼奶长大的，毛泽东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教父。红二代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共官方所说的毛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即向文革一路狂奔的年代，他们青春期躁动的思想也正是定型于文革期

间。文革可以说是他们的青春情结。毛的敌对思维、斗争哲学，崇拜暴力，挑动仇恨等思想，深入红二代的骨髓，成为他们的红色基因。

譬如，文革中大行其道的毛语录“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等等，都已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成为集体潜意识和思维定势。

由于红二代的成长环境先天不足，完全被极权政治所主宰，他们的政治狂热到了一种违悖人性的程度，更形象地说，他们是疯狂时代产下的畸形儿。一方面，他们在上学的年龄，被剥夺了读书的机会，而且被灌输了一整套毛思想中的歪理邪说，知识结构残缺不全，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他们自视根红苗正，血统高贵，有强烈的“红色江山意识”，热衷参与政治，内心有强烈的愿望和激情去捍卫父辈开创的革命事业，保卫最高领袖，保卫党，保卫红色江山。红二代后来虽然经过命运浮沉和人生的摔打，其中不少人经历了失落、怀疑、幻灭的过程，但从整体而言，这种以保党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底色始终保留下来，经过岁月的沉淀，转变为现实政治中强烈的掌权意识。

◇ 在崇毛、家仇上红二代陷伦理困境

在如何对待毛的文革遗产的问题上，红二代普遍陷入一种内心挣扎的困境：一方面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红色江山的开国之父，另一方面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中又遭到毛的整肃，家破人亡。这一点，在红二代头面人物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现代精神分析学有一个术语——俄狄浦斯情结，说的是古希腊一个弑父恋母的悲剧故事而陷入伦理困境。红二代在崇毛和家仇的问题上，就陷入类似的伦理困境。

在红二代中，刘源、薄熙来、孔丹等人的父母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刘少奇被活活整死，死后连姓名都是假的；薄熙来的母亲胡明在被押送回京的火车上死得不明不白；孔丹的母亲许明因江青点名，自杀身亡。此外，林彪之女林立衡，陶铸之女陶斯亮也是同样的遭遇：林彪被迫离国，死无葬身之地，被苏联人割去头颅；陶铸则是在重病中被强迫与家人生离死别，最后一人孤独死去。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在文革中被关押多年，劫后余生，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得了。顺便一提的是，人们普遍认为习近平受其父牵连，因而对毛怀有怨恨。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毛对习家是恩大于怨。当年长征初到陕北时，毛对习仲勋有救命之恩，后来虽又整了他，但那是为了反击彭德怀的翻案，铲除西北山头，习父遭池鱼之殃。

虽然这些红二代的头面人物在文革中的遭遇不堪回首，但他们却无法像普通人那样公开诉说自己父辈的冤死，更不要说伸张正义，告慰父辈的在天之灵。红二代中除了少数对文革有所反思外，如陈毅之子陈小鲁、罗瑞卿之女罗点点、马文瑞之女马晓力等，多数人对文革的态度暧昧，避免公开批评文革，往往轻描淡写，避重就轻，一笔带过。

◇ 红二代崇毛实为政治算计

在这方面，刘源的表现很有代表性。他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咬着牙，不使自己变疯。”但在谈到文革祸首毛泽东时，却又竭力为他开脱，说：毛做了许多错事，也做了更多的好事，毛搞文革的动机不坏，只能算渎职；父亲虽然惨死，但作为二把手，没有制止动乱，也是大错。

刘源这样为毛开脱，当然不仅是崇毛情结作祟，其中还有政治算计；但无论如何，这已经逾越了人伦底线。毛本来对他们有杀父弑母之仇，但饮水思源，毛是红色江山的开创者，是他们心中的大英雄和手中权力的来源，最后崇毛情结和政治算计占了上风，家仇搁置一旁，还美其名曰“照顾大局”。子报父仇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而刘源们非但不能为父母的冤死伸张正义，反而还要把文革的罪魁祸首奉为神明，顶礼膜拜。这是一种何其荒诞的精神错乱！况且文革浩劫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仇”，而是中华民族的“国殇”，无数在文革中惨死的冤魂至今仍在冥冥之中游荡，不得安息。

◇ 毛是红二代掌权的政治资产

掌权的红二代用“红色信仰”、“江山意识”、“大局意识”来为自己崇毛辩护，统统不过是托辞，是为了共同分享权力的盛宴。其中最具有象征性的莫过于前些年王光美出面宴请毛的家人，毛、刘两家“相逢一笑泯恩仇”，握手言欢；她还特别以“毛的学生”在韶山毛纪念馆留言。难道她真的忘了刘少奇在文革中是如何惨死的，忘了自己备受屈辱的经历了吗？当然不是，她这样做，就是为了从政治上给刘源的上位铺平道路。

红二代的头面人物对这种做法心有灵犀，为了上位，都上演过类似的戏码。习近平在上台前曾三次上韶山参观毛的故居，留下一句肺腑之言：“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里会有今天的我！”，感恩之情溢于言表。薄熙来被发配重庆，为了重回北京问鼎中央，打的也是毛牌。他曾私下表示：想来想去，只有毛思想才是党内正资产，要回到毛。他搞“唱红打黑”就是从中获得的灵感。总之，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政治上的领路人，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血缘关系。掌权红二代的政治生命、思路和手段都来源于此。

习近平上台之初，人们普遍对他抱有希望，期待他能像其父习仲勋那样开明，解决江泽民、胡锦涛两代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带领中国完成宪政转型。但是，习的所作所为让人们大失所望，上台后全面左转，举毛旗，开倒车，可以说是集权有术，治国无方。更有甚者，习近平还处处仿效毛，搞个人崇拜，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为文革解咒，以至官媒年初铺天盖地对任志强搞文革式大批判，虽无其名却有其实，被称为“十日文革”，习也落得“毛二世”的骂名。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走火入魔，重蹈文革老路？下面，试图对此作一分析评述。

习近平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机缘巧合的结果，几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首先，得益于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当年，邓确定江泽民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但对他并不放心，又指定胡锦涛作为第四代领导人。这是邓对中共接班机制的一大创新，以防止他身后出现毛式的个人独裁。在这种格局下，江泽民成了“夹心饼干”——上有邓小平，下有胡锦涛，直到邓死后，这种局面才改变。其次，江派和团派相争，习成了最大获益者。江不愿让团派人马李克强接胡锦涛的班，遂如法炮制隔代指定的做法，以邓小平之道还治胡锦涛之身，力推习近平取而代之。第三，其父习仲勋形象开明，在党内口碑很好。第四，习本人善于隐忍藏拙，表面恭顺，与人无争。后面这两个因素，是习近平胜出党内强劲对手薄熙来的原因所在。

◇ 中共高层危机共识

应该说，习近平很清楚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多年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逼近全面爆发的临界点——官场腐败已经使共产党丧失人心，薄熙来事件更让人们看到中共高层内斗的黑幕和丑恶；更令人头疼的是，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好景不在，这本来是

六四镇压后支撑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来源，现在由于经济形势全面恶化，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危及共产党的执政。习痛感“亡党”的危机，他不想当亡党之君，红二代的“红色江山情结”也不允许共产党亡在他的手里。他必须有所作为，寻找挽救之道，如果还像胡锦涛时代那样“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那将是死路一条。

这种危机感并非习近平所独有，而是薄熙来事件后中共高层的共识。人们普遍对中共高层听任习上台后大力集权感到迷惑不解，其实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危机感，使得党内高层容忍了习近平集权的做法，同意改变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局面，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而习近平则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反腐抓权，摆脱老人束缚，树立个人威权。他在十八大前曾“神隐”半个月，以退为进，要求中央授予他全权应对危机，否则就撂挑子不干，中共高层不得不表示同意。

如前所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毛泽东轻轻放过，开展的所谓“彻底否定文革”只是“猫盖屎”，并没有真正触及要害问题，清算毛的历史罪责。毛仍然是中共神坛上供奉的偶像，毛思想仍是中共执政的指导思想，不容任何挑战，是维护一党天下的镇国之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执政者为了获得“合法性”，就必须举毛旗，即使政治强人邓小平也只能是偷梁换柱，打着毛旗搞改革开放。在邓时代，中国的政治模式是“邓头毛身”的二元结构——邓思想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而政治架构则仍是毛建立的一党专权体制。“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就是邓思想和毛体制两者杂交的畸形怪胎。这种体制成了权力寻租的天堂，造成官场贪腐猖獗，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并没有享受到多少改革的好处，反而成为牺牲品，他们为官方宣传毛时代“清廉公平”的假象所蒙骗，把毛视为他们利益的保护神和反抗社会不公的旗帜。这就是习近平上台时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土壤。

◇ 表面毛邓并举，实则厚毛薄邓

作为红二代，习近平本来就有崇毛情结，从薄熙来搞的“唱红打黑”中更是看到毛在底层民众中的能量。红二代虽分左中右，但他们最大的共识为毛是共产党的“正资产”，从政的红二代更是从捍卫红色江山的角度，把毛作为政治图腾和他们掌权的合法性来源。尽管他们承接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事业，权力地位皆来源于此，但邓是个实用主义者，只干不说，也说不出来说出来就是对马列毛的离经叛道。所谓“邓理论”说到底就是三论——“猫论”、“摸论”和“不争论”，对治理国家虽然实用，但难登大雅之堂，处于“失语”的窘况。这迫使掌权的红二代从毛那里寻找执政的思想资源和话语权。同时为了挽救共产党，也需要把毛请回来作为震慑党内贪腐势力的尊神。

但是，毛已被邓小平虚置多年，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符号，而要复活毛作为执政的话语权，一大罩门是如何为毛发动文革解套，因为否定文革是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基石。为此，习近平上台之初刻意模糊自己的政治面目，打出一套“迷踪拳”，以“中国梦”开局，表面上毛邓并举，实则厚毛薄邓。他当中共总书记后外出视察的第一站是深圳特区，向外显示他将继续执行邓的改革开放路线；与此同时，习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接着又隆重纪念毛120周年冥辰，大力颂扬毛的历史功绩，并率全体中央常委到毛纪念馆祭拜，后来又访延安，走古田，拜西柏坡，登井冈山。通过这一系列动作，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毛思想重返政治舞台，成了习近平手中统领全党、号令天下的大棒；在为毛解套的同时，习把文革的幽灵也从魔瓶中释放出来，从此魔咒上身。

◇ 抓权立威和心术权谋深得毛真传

习近平上台后，施政的突破口选择的是铁腕反腐，这是经过精心谋划的一石两鸟：共产党的腐败已经丧失人心，必须大力反腐才能救党；同时通过反腐立威，塑造强人形象，慑服党内各派势力，集大权于一身。可以说，习在抓权立威和心术权谋方面深得毛的真传。他在上位之前，一直在等待时机，隐忍韬晦，与各方交好，示人以憨厚老实、与人无争的印象，宁可被认为平庸无为，也绝不像薄熙来那样锋芒毕露；而一旦上台就摘下面具，一手反腐一手抓权，颠覆了十八大确定的习李体制。

习近平仿效毛的故伎，抛开原有的党政系统，另起炉灶，以“小组长治国”，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大最高头衔外，还兼任多达七个中央一级领导小组组长职务，前不久又担任军委联指总指挥，把党、政、军大权全部抓在手里。不仅如此，为了彰显他作为总书记的权威，他还把党章中规定的总书记只是常委会的召集人，改为事实上的“主席制”，强调总书记总揽全局，重回毛时代的以党领政，让分管人大、国务院、政协等部门的常委向他汇报工作，把总书记与常委之间的关系变为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

◇ 选择性反腐意在保党揽权

应该说，习近平的开局不错，使出反腐、亲民、集权“三板斧”，搞得有声有色，不仅反腐为习赢得不少民心，就连对他的集权，人们也多是给予理解和容忍，寄望他大权在握后能推动政治改革，完成宪政转型。可是，人们很快就看出习的反腐虽然声势很大，但治标不治本，在制度上毫无建树，反腐不过是为了保党天下，而一党体制恰恰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依旧，非但阳光法案迟迟出不了台，反而把要求公布官员财产的民间活跃人士抓进监狱，反腐作秀已经难以再吸引一旁看戏的民众；而被反腐搞得人人自危的各级官员也看出习反腐并不是出以公心，一碗水端平，而是选择性反腐，是为了抓权，扶植自己的人马上位，不过慑于反腐的威势，他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后，并没有如人们所愿启动政改，相反还在政治上开倒车，批宪政，镇压民间活跃人士，开展舆论斗争，禁锢言路；在抓权方面更是毫不含糊，咄咄逼人，炮制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新四人帮”之说，硬把挡路的江派、团派绑在一起打。

当然，习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苦衷，上位前他一直小心翼翼，韬晦避嫌，没有建立自己的班底，遍布中共政坛的不是江派，就是团派；而他的时间并不多，如果按“台阶论”提拔自己的人，缓不济急。对习来说，江派人马虽然占据要津，但更大的威胁却是有年龄优势的团派，经过多年经营，遍布省部级，形成地方包围中央之势。习很清楚如果不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在党内形成自己的一统天下，一旦得罪的官僚集团反扑过来，他的结局不妙。

◇ 仿毛凸显缺乏政治智慧与能力

在反腐抓权的同时，习近平重拾毛这把刀子，对毛亦步亦趋，不仅在抓党治军中频频引用毛的语录、照搬毛的做法，如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军队政治工作的新古田会议；而且在语言风格上也刻意模仿毛，喜欢引用粗鄙直白的俗语，如“老虎苍蝇一起打”、“洗洗澡、治治病”等；习在行事做派上也是竭力仿效毛，把自己打造成毛那样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凡此种种，成为习执政的一大特色，让人感到毛时代又重新回来了。

习近平举毛旗，除了拉大旗做虎皮的政治考虑外，凸显他缺少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和能力的尴尬，只能拾毛牙慧，向老祖宗乞灵。习近平这批红二代从小是喝狼奶长大的，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血缘关系；文革是他们思想成长定型时期，有着他们的青

春情结，留下很深的人生烙印。这种深入骨髓的崇毛情结和文革思维定势，一遇机会便会表现出来。

毛式文革话语已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反过来又影响着他们的思维行为方式，成为他们执政模式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习的执政思路 and 手段不可避免地带有毛时代的印记，散发着文革的气息，不久前提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就是最新的例子。

□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

~~~~~

# 【学术探讨】

## 文革“语录崇拜”背后的逻辑与法理

• 王 毅 •

### ◇ “毛语录”在文革中的两大神圣功能

1966年下半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毛主席语录》，高潮持续到1969年初中共“九大”召开之际。当时绝大多数省市都是按人口数量印刷，很快达到全国人手一册甚至多册。从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出口到次年5月的八个月里，中国国际书店就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14种文字的《语录》共80多万册。研究者推算，“文革”期间，国内外用50多种文字出版了《毛语录》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

署名作者为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以下简称《前言》）在1966年底向世界发布，由此不仅将当时已经席卷中国的“语录崇拜”、“红海洋”、“破四旧”等狂潮进一步升温至烈火烹油般的境地，而且这篇文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之“伟大”的一系列经典定义、它所规划“普及伟大思想”的整套强力方案等等，都对“文革”的内容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革”后，有关《毛主席语录》（以下简称《语录》）与《前言》的史实已有详细披露，但唯独对所有这些事件与现象背后的“文革法理”、“文革逻辑”仍缺乏较深入的梳理。所以本文在此方向上的简要探求似乎不为多余。

“文革”经历者应该记得：“毛语录”所以笼盖当时一切社会空间，主要是因为它在两个基本方面都承担着重大功能。其一，它成为“红海洋”、“三忠于四无限”等“文革造神运动”及其一切仪式仪轨中使用最便捷有效的神圣道具；其二，恰似旧时驱鬼者必须依仗具有魔力的法器一样，《语录》成为了当时“横扫一切牛鬼神蛇”（抄家、揪斗、大批判等）狂潮中，象征与代表横扫伟力的武器。总之，“毛语录”的神圣功能表现为互为表里的两翼：把崇拜“大救星”、“红太阳”的热潮推升至无比热烈的境地，以及赋予“横扫牛鬼神”以神圣合法性与无往不胜的力量。

而《前言》的全部内容与发布时效，即根据上述两翼而展开。

### ◇ 《前言》在“文革启动程序”中的逻辑成因

从文化内核来看，贯穿“文革”始终的纲领（“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文革”空前的野蛮性、蒙昧性与疯狂的内在魔力，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一种“二元世界模式”的登峰造极。这种世界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借助人类学研究可以知道：世界众多民族原始宗教体系的基本结构，都是把宇宙划分为由至上的善神与绝对的恶神分别统领的两大阵营，而两者的斗争所以是整个宇宙的“纲”，乃是因为只有经过这殊死搏斗，至上至善的伟大创世神才能从最邪恶歹毒的牛鬼蛇神手里拯救万民、开辟出永世光明的世界，并因此使善神展现“大救星”（救世神）的禀赋。

中外众多民族都是这样建构起文明最初阶段的世界图景，所以人类学用“二神教”（dualism）来说明原始宗教的这个重要特点，著名的比如：古印度宗教中光明神（Indra）与夜间及邪恶神（Vritra）搏斗；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中国旧称“祆教”、“拜火教”）认为，代表光明的至上神（Ahura-Mazda）永远在与黑暗神（Angra Mainya）殊死斗争；中国各民族神话或原始宗教中，类似例子也有无数。

显然，上述“二元宇宙模式”通过“文革”而充分复活并极度膨胀：一方面，人们必须将伟大至善的救世神（“大救星”）以及他的形象、行迹、任何只言片语等等的神圣性，推崇至无以复加，并竭力歌颂崇拜其开辟光明美好的终极世界、在极端危难中从恶神手中拯救世界的无比伟业。因此，通过随时随地的“无限崇拜”而造就出声势极其浩大热烈、裹挟亿万国民日夜投身其中的“文革造神运动”，就是文革启动阶段最重要、且最具鲜明宗教特征的运动。

为实现上述狂热崇拜，必须创造出一套最便捷有效，因而能够极度普及（《前言》对此规定：“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仪式仪轨，惟其如此才能使人们的“无限崇拜”膨胀到满足“文革”运行需要的程度。于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借助中国宋元以后长期流行的“语类体”（理学）与“语录体”（禅宗）而打造出《语录》与“文革语录文化”，从而实现了崇拜的高度便捷化操作——比如中共“九大”上对林彪《政治报告》的表决程序就极简单明了，即除毛本人之外的所有与会者一律以高举《语录》以示无限拥戴。

也正因为这种“打鸡血”般无比亢奋的崇拜方式高度契合了“文革造神运动”的需要，所以它的简易化、便利化趋势也不会止步，而是必然经过《前言》等的强力鼓荡，持续衍生出“老三段”（从《语录》中简选出最神圣、最经常被引用的三段话）、“语录操”、“语录歌”、“语录像章”等五花八门的“再简化版”与“表演版”，从而造就出人类宗教史、社会史、美术史等领域里空前炽热的狂潮，激发出“二元模式”登峰造极所必需的巨大能量。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诸如此类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文革”时一定要把《语录》的神圣性推崇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例如《前言》就使用“精神原子弹”等极端语汇）？为什么需要通过许许多多具有鲜明宗教特征的仪式仪轨来表演《语录》的无比神圣及其对世界的涵盖力？为什么无数红卫兵造反派，他们必须以随时效忠《语录》来展示自己行为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展示自己生命最高价值就在于“誓死捍卫伟大思想”……

与上述狂热崇拜完全同步、互为表里的，则是二元模式中同样重要的另外一极：人们又必须同时臆想出代表永世黑暗的牛鬼蛇神（“刘邓路线”、“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如何极其邪恶歹毒，臆想出假如其得逞将给世界带来的无边灾难（“文革”流行语录的形容：资本主义复辟的结果是“千百万人头落地”），臆想出这天大威胁的无处不在。

二元模式这另一极注定导出的绝对律令就是：一切国民必须日夜警惕诡诈阴险的牛鬼蛇神对圣人及其伟业的进攻，而且只有彻底服膺“毛语录”所代表的“伟大思想”，他们才可能识破此类阴谋，比如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的著名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红旗》同年第7期全文转载）中的警句：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资产阶级本性，总是要想尽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采取了更加荫蔽、狡猾、迂回曲折的手法，继续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有一定的欺骗性和严重的危害性，……如果我们对这些不拿枪的敌人失去警惕，……我们的国家就有变色的危险。……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见到错误的东西就批判，见到毒草就铲除，见到牛鬼蛇神就打倒，……只要我们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就一定能够识破和揭穿这些牛鬼蛇神的真面目，把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可见，在“伟大思想”的指引下，时刻对“荫蔽、狡猾、迂回、曲折”的牛鬼蛇神及其毒计保持“高度的警惕”，时刻不忘“观察一切、分析一切”，以求从每个角落、点滴蛛丝马迹中发现和揪出魔鬼，这是世界的唯一出路——所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刻绷紧阶级斗争的弦”遂被定义为亿万国民生存的根基。

既然“红海洋”、“伟大思想光照全国”、“横扫牛鬼蛇神”等“文革”基本内容，都并非偶然地源于二元世界模式的深刻内在逻辑，那么应该不难想到，这套逻辑之魔力的展现远远不会就此止步，相反它还必然引导出一连串重大结果；而所有这些内容，又都与下文所讨论的那个关键悖论紧联在一起。下面具体来看。

#### ◇ “语录崇拜”背后的“文革法理”

进一步剖析《前言》所鼓吹的伟大“精神原子弹”，则可以看出一个巨大悖论的成因，即为什么造神运动牺牲天量社会成本而打造出了“无比伟大的先进思想”及其许诺的无限美好世界图景，但结果却是相反地导向了蒙昧与野蛮。这主要因为：

一、这套“伟大思想”同构于具有高度禁忌性的权力体制。也就是说，唯有垄断权力（或注定将剿灭牛鬼蛇神而夺回一切宇宙权力）的伟大人物、以及由其授权的人群与组织，才具有神圣资格掌握与代表“伟大思想”。而这个禁忌属性最直接显著的逻辑结果就是：“有权才能有理”、“有权力必定要实现对于宇宙真理的垄断”、“有权力才能有对道德伦理、是非良知等一切社会价值坐标的最高裁决权”……，亦即“文革”时最流行的林彪警句所宣示：“有权才能有一切”！

反过来说，代表“伟大思想”的伟人及其授权人群，之所以只有他们才能万世不替垄断宇宙真理，是因为如斯大林名言所说他们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哀悼列宁誓词》）——而如此的“特殊”在法理上终极指向的，必然是至上宇宙神性与无边世俗权威的集于一身，即马克斯·韦伯所说“奇理斯玛”（charisma）；而如此神圣，它当然与生俱来就绝对免于质疑、因而与理性方向完全悖逆。比如当时人人都必须日夜高唱高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但为什么只能“就是好”？是否可能“就是不好”？诸如此类对“伟大思想”、“革命路线”的怀疑与触犯，不仅绝对禁止，而且是必须立刻予以严惩的罪大恶极。

随之而来，代表“伟大思想”的大救星及其授权者，天然并永远地居于法律等一切社会约束力之上，甚至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成为新宇宙（“文革”流行语：“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之规则的创建者。如此逻辑之下，他们对于任何可能限制自己的法律与秩序，都有权予以无限的藐视，都可以“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所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遂成为亿万红卫兵造反派的立身之本。

而一旦失去“大救星”的恩泽，则这些红卫兵造反派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神圣资格就立刻消失，于是他们就如“已陈之刍狗”那样可以被任意抛弃——刚刚还在以“伟大思想”的名义审判“牛鬼蛇神”者，转瞬就会沦为别人同样以神圣名义实施审判与践踏的受难者，而这种走马灯般轮回颠倒的随处可见，是“文革”最骇人的景象之一。

反过来说，“伟大思想”的垄断者也必须通过这一轮接一轮抛出、“揪出”新的牺牲品（比如刘少奇集团之后又有林彪集团……），才能自证其对牛鬼蛇神阴谋的始终明察秋毫，即“文革”经典语录所形容：“牛鬼蛇神隔七八年就要跳出来”。而如此的异常残酷，又真切验证了一项重要的宗教法则：只有通过定期的血祭，才能永不间断地维持图腾、救世神的伟大与圣明。

其实，赋予最高权力者以拯救、统治宇宙的最高神性与神格、并因此使其高居一切法律之上，这种与法治方向完全悖逆的运作，在中国历代造神运动中久已演练成熟，并因此使得中国传统法律要义与基督教背景下的西方法律宗旨完全异质（详见拙著：《法律制度与“历史三峡”》，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147页）——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文革”在西方法治国家不可想象的原因。

二、“伟大思想”所以要具有无边的神圣权威，是因为惟其如此，才能实现对一切所谓“反动思想”的察觉、甄别、定义、审判。欧洲中世纪时，这种发现、裁断与审判的无限威势来自代表上帝的宗教裁判所，而20世纪以后的“伟大思想”也同样垄断着对无数异端的审判与剿灭之权。反过来说也一样：“伟大思想”的最伟大功能，就是彰显神圣审判权的笼罩宇宙、无奸不察、无往不胜。亦即《前言》所说：“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所以对其反对者必须“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即是说要实现“伟大思想”的崇高性，就必须将对异端的“诛之讨之”普及开来——所以红卫兵、造反派的抄家、揪斗等无数暴行，在仪式性程序上都必须以宣读语录、高唱《语录歌》等作为开场白。这类“神判”仪式中必定要征引的经典段落比如：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可见只有对语录（“伟大思想”顶级结晶）的征引展示，才能给予这些暴行以最高合法性依据。

又因为“伟大思想”主导的审判与斗争乃是拯救世界的前提，所以这种斗争必须采用残酷无情的手段才能奏效（即战胜臆想中牛鬼蛇神的无比阴毒险恶）。比如遇罗克、丁晓祖、

李启顺、林昭、冯元春、陆兰秀、李九莲等众多文革受难者，都是被冠以“坚持反动思想”、“恶毒攻击伟大思想”的罪名而被杀害。又如：

原来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周秋鹏：《毛远新下令割喉管不止张志新》）

这里最值得留意的乃是剿灭众多“反革命”的方式，其发明与普及是直接出自“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神圣需要。

尤其因为剿灭“反革命”被认定是“伟大思想”光耀万世、普济天下所必须，所以它决不仅是极少数人的专职，相反，它是全社会几乎一切成员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即如“文革”时无数令人胆寒而又极为神圣的口号所宣示：“群众专政万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

三、“大救星”以外的一切人都是最无知的，在“伟大思想”的面前他们必然是卑微谬误、甚至是背负深重罪愆的庸众，因而永远无权染指“伟大思想”的原创源头。相反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作为命定必须匍匐其下的如蚁之众，永不停歇地崇拜与领会“伟大思想”并“彻底改造世界观”。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沾沐“大救星”之恩泽，获得生而为人、被社会接纳的合法资格。

“文革”发动者尤其强调：对“伟大的先进思想”之威胁不仅存在于牛鬼蛇神的有形进攻之中，而且更深藏在每个国民内心以私利私欲为代表的意念之中；于是强制人人“彻底改造世界观”、“狠斗私字一闪念”以剿灭其内心的魔鬼，就是“文革二元逻辑”中最必要一环。又因为有了如此深刻而无边的用武之地，于是作为最能代表“伟大思想”而与牛鬼蛇神相对峙的神圣之物，“毛语录”无往不胜的神效也就必须涵盖全社会一切微细空间，包括每个家庭——所以那时即使在家里，人们也必须经常“讲用语录”、斗私批修。

为什么必须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外）与“狠斗私字一闪念”（对内）融合一体才能实现“伟大思想”的普照？对此，林彪在1967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的讲话》中有明确阐说：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要开办学习班，……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可见，为什么以日夜礼拜、学习语录为标志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用会”、“斗私会”、“宣传会”、“宣传队”、“批斗会”等等成为“文革”的经典内容？又为什么所有这些举措，都必须具有遮天蔽日的无比声威与令人胆寒的喧嚣？其原因仍旧在于：舍此则根本无法使“大救星”与邪恶牛鬼蛇神之间的殊死搏斗（“文革二元模式”），升温至日夜高效运行的狂热状态。

未经历过“文革”者多半需要特别说明才能知晓：上述对“伟大思想”的学习与正常社会中的知识学习完全不同，因为其天条通常是“学习”者人身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完全丧失（“学习班”成员因不堪凌虐而自杀，在当时非常普遍）；其前提更包括：亿万“学习”者在神圣的“伟大思想”面前，注定是天生卑微谬误、身负深重罪愆的庸众，他们必须永远通过日夜不停“狠斗私字”，或者在学习班中相互监督、相互揭发等等“帮助”下，才可能领会“伟大思想”。当时“学习热情”之真诚，可举一位受害者的回忆为例子：

某日，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来谈。他说：“将来的人，从现在的文艺作品中知道‘文化大革命’，只是‘坏人整好人’而已。其实，哪里是这么简单呢？我们当‘牛鬼蛇神’的，当时往往比革命群众更虔诚些。”……更可怕的是被“整”的人里面，也有相当一些人虔诚地相信，或者努力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确是“修正主义分子”，应该被“整”，才可以得到挽救。（舒芜：《虔诚的整人和挨整》，《舒芜小品》第199—200页）

所以《前言》命令用伟大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而这个巨大社会工程的辉煌实现之路，正是通过同样巨大规模的自“整”与互“整”才可能启动。

#### ◇ “精神原子弹”与20世纪初以来中国启蒙路径的关系

“精神原子弹”的横扫一切，除了“文革”当时的动因之外，还可能有更久远也更深刻的成因。

拙著《中国皇权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十二章第七节《西方“启蒙”水到渠成的形成方式以及法治传统的基础作用，它们与东方“启蒙运动”的不同路径》详细分析后的结论是：在不具备西方法律传统、社会结构对统治权力的多维制衡等前提下，近代以后急于以启蒙挽救国家危局的中国思想家们，不得不把前途寄托在“思想大纛”扫荡一切的伟力之上，希望把“新思潮”、“思想革命”打造成为横空出世、具有无限魔力的千钧利器，希望尽快把“启蒙”张扬鼓荡成为一种瞬时就能席卷天下的“运动”，并且把对于“启蒙”的解读聚焦在这个层面中。

在此取向上，从陈独秀、鲁迅到青年毛泽东等一大批有志者高度一致，比如鲁迅在20世纪初就主张以“心声”、“意力”、“尊个性而张精神”、“新精神（思想）”等等为核心而推动中国变革，其浪漫形容是：“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摩罗诗力说》，1907）；陈独秀后来叙述“西洋文明”输入给中国带来的变化，认为其最初领域为学术、其次为政治，而最后的彻底解决则要归宿于“伦理的觉悟”（《吾人之最后觉悟》，1916年2月）；又如张继、罗家伦在五四重要舆论阵地《新潮》发表宣言《思想革命真是救中国的根本办法》，认定“近来主张广义的文学革命，即是思想革命，真是救中国的根本办法。”（《新潮》第2卷第2号，1919）

宗旨更为显豁、笔调更具激情的，则如青年毛泽东的擘划：

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源为号召，天下之心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也！（毛泽东：《与黎锦熙书》，1917年8月23日）



在此设计里，启蒙的根本目的就是“以先进思想”（宇宙真理）作为一切社会进步之本源，以此为模本而“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并且造就“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的无限魔力——从这套以扫荡天下为目标的方案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50年后“精神原子弹”的雏形。

总之，在启蒙的路径上，欧洲的“启蒙”与中国的“启蒙运动”有着非常重要的不同！欧洲史上经过一代又一代极其广泛而凡俗的利益博弈与法治进程，逐步构建起国民权利普遍而刚性的畛域、并由此积淀出启蒙大潮的水到渠成，这与中国近代以后竭力张扬思想与激情的伟力、希望依仗“宇宙真理”、“思想革命”而造就“根本解决”方案的启蒙方向，是大相歧异的。而传统中国在启蒙所需的基础资源（法治传统、国民权利的长期成长积累、社会结构对统治权力的多维制衡、城市市民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发育……）上的完全不具备，这就使得中国思想家对于西方启蒙的急切追慕效法，在不知不觉之中落入了化橘为枳的窠臼之中，并由此而使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付出极巨大代价。

而所有这些代价里最为惨痛的，可能就是“文革”以“语录文化”等等为耀眼旗帜而引爆的“精神原子弹”。因为它的爆炸给中国大地与亿万国民内心留下的无边的焦土，使得国人最终走出野蛮、蒙昧的过程，必然格外艰难与漫长。

□ 原载《凤凰网》

~~~~~

【读史笔记】

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四）

• 钱理群 •

（续 z k 1 6 0 5 b）

更叫人无法接受的，是竟然让孩子成为杀场的陪绑者！这真是匪夷所思：市委大院墙上出现了一条“打倒毛主席”的标语，公安局查案，认为是孩子在大人唆使下写的。当时院里两派斗争正激烈，一个中层干部的对立面立刻插手，内定是他才有八岁的儿子写的，就把儿子抓了起来，威压、利诱孩子交出后台，遭到拒绝后，就硬把他送到了刑场。“我给他们带到刑场，一片大开洼地，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给绑着，没捆我，我可吓呆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我们，其中一杆枪对着我的脸，我忽然看见不远一群人中有爸爸！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逼爸爸，叫他承认是他叫我写的反标。我放声大叫爸爸，要跑过去。当时管执行的人大喊一声：‘放！’‘啪’地枪响。我旁边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哐当’全栽倒，一个脑袋打飞了，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我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眨眨眼，动动嘴，好像全没知觉了。只见爸爸张着大嘴朝我跑来，扑向我，一下子把我紧紧抱住。我说：‘我死了吗？’爸爸说：‘没有，孩子，你别怕。他们这是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我听了，噗地笑了，脑袋扎在爸爸怀里。我真的以为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但从此我就成了“小反革命”，“我一下子长大了，也垮了。这‘小反革命’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在我身上背了十年！”

当事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谈到后来得到平反，却无法具体落实，弥补刑场陪绑所造成的精神创伤，说了一句沉重的话：“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34〕但这也正是要害所在：中国的政治，特别是文革政治，最大的罪恶就是对人的心灵的肆意践踏、蹂躏，而伤害到儿童，并且不择手段，就真正罪不可赦了。

文革中的儿童，还有另一种命运：父亲早逝，在工厂工作的母亲突然被发配到湖北深山参加备战工程，把只有十四岁的“我”和十岁的弟弟留在城里的家。我一下子承担起“当家人”的重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只能避着热闹，加着小心，像一个家庭主妇那样，操持着我和弟弟两个人的米油盐。星期天，听说哪个菜站处理便宜菜了，我便和穷孩儿一起跑去，一两毛钱地背回一堆。因此，我为曾经买到过的几次极其便宜的青菜而兴高采烈过很长时间，至今我都无法忘记。仿佛那是一个再也不会有的奇迹。一毛钱可以买到十斤甚至十五斤西红柿，穷人家的孩儿，心里就是这些，说不上宏图大志，更不敢和人家去造哪门子的反。只是老老实实在地过着，活着”。一年半以后，母亲回来了，知道我还从每月二十几块的生活费中，省出钱来，给自己添衣服，为弟弟买了鞋和裤子，“尽情地哭了一场”。

[35]——过去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是为生活所迫；文革中的“早当家”却是政治所逼。儿童因此失去了他应享受的游戏、学习的权利。用周作人的说法，这是人生季节的颠倒：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残酷。

难逃文革厄运的，妇女、儿童之外，还有小动物。

这同样是痛苦的，带着血腥的记忆——

“1966年时，我家养着一只黄猫。一天早上，见到街道里贴满了红卫兵的‘勒令’。意思是要消灭民间饲养的动物，包括鸽子、鸟、鱼、狗、猫等。他们威胁说，如果自己不处理，则要集中杀死，斩尽杀绝，据说养动物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于是赶紧把黄猫放生，它又跑了回来；送到农村去，不久就听说又跑走了，据说红卫兵打死狗都扔到东大桥的臭水沟里，就赶去收尸。一看，就呆住了，眼泪刷地一下流了出来：“那条由西向东的臭水沟里像下饺子一样，扔进了上百只的猫。有的猫被石头击中，浮在水上，泛起一片血。有的猫挣扎着从河心向岸上游，有的猫被竹竿和木棍抽得拼命向河心游，河里一片嘈杂，一片嚎叫，一片沸腾，一片血腥”。[36]

这是爱养鸽子的北京大爷最惨烈的记忆——

“熙熙攘攘的鸽子市上空突然响起了冲锋号声。只见东直门城楼上，并排站着六个红卫兵小将。他们一手叉腰，一手举着军号，面向鸽子市这边用劲吹着。还没等鸽子市上的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已经被臂戴红袖标的红卫兵和工人民兵包围了。只要看见拿鸽子的人，他们立刻冲上去，抢过鸽子就往地上摔，到处都能听到鸽子‘噗、噗、噗、噗’的声音。一时间，东直门外，护城河边，那方圆里的地面上，鸽子们尸横遍野，其情其景让人惨不忍睹”。接着就向养鸽子的大爷们下了死命令：“下午四点以前，要不把鸽子脑袋送去，就把自己送进去”。“那天中午，我们一边哭一边用菜刀剁鸽子的脑袋。鸽子的鲜血把切菜的案板都染红了”。[37]

这里对生命的任意屠宰，是令人发指的。而且用的又是“革命”的名义：对小动物的爱和保护居然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如一位回忆者所说，在那个年代，仿佛真善美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同义语，全在扫荡之列”。[38]“为了‘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就向无辜的动物大开杀戒，而且将屠戮变成‘革命的盛大节日’，到处插满红旗，吹着军号。更令人痛心的是，执刑的屠夫，竟然是刚成年的青年和未成年的孩子！

可以说，文革中妇女、儿童、小动物的厄运，对生命（无论是人，还是动物）的漠视、践踏，特别是对弱小生命的伤害，都显示了文革反人性、反人道主义的本质。

（五）全民“窝里斗”的怪圈

有人把中国人在文革中的相互残杀，分为两个阶段：“初期的时候还可以说是一场圣战，那么后来完全是一场权力战了，一场权力的再分配了”。[39] 这样的截然划为两个阶段，或许有些简单化，但如果说相互残杀的动因和表现有两个方面，大概是可以成立的。大体而言，红卫兵的暴力，基本上是一种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革命狂热，虔诚地跟着领袖去杀人，和想象中的“敌人”搏斗。而更多的成年人的相互厮杀，“实际的利益和矛盾更具有实质性”，“即使是在最狂热的意识形态口号下，人们的行为也往往具有现实的利益动机”，[40] 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永不停息的派系斗争。

这里就有一个三次成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的“故事”。事情从抗战时期开始：“我们村有两大家族，一姓王，一姓李。我姓李。两个家族打根儿就斗，势不两立”。八路军来了，村干部大多姓王。我当时是儿童团长，不知天高地厚地写文章批评村长“好烟好酒好玩钱”。这就遭来影响终生的大祸。“村长说他代表党，反对村长就是反对共产党。什么人反对共产党？国民党特务呗”，就这么把我内定为“特嫌”。其实就是“不能让我这个李家人冒头当儿童团长”，无非是安个“反党”的罪名，把我给撤了，并且装进了档案。十七年后的1956年，我已经因为单位上的总支书记要提拔他的一个亲戚排挤我，调离了原来的某出版社，鸣放时期出版社党支部书记特意来公函，要我回去提意见，我给党总支书记提了几条，反右运动就把我打成了右派。我这才明白，根子在党总支书记和支部书记之间有矛盾，在鸣放时支部书记因为知道我对总支书记有意见，就拿我作枪使，反右一反过来，我便成了牺牲品：我就像当年卷入家族宗派斗争一样，又陷入了党的干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到了文革，所在的新出版社的书记要整社长，就因为我与社长合作得很好，就给社长安上一条“重用右派”的罪名，把我也揪了出来，并把早已否定了的、但仍留在档案里的“特嫌”问题再度提了出来。这样，“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却被当做反革命几十年，翻来覆去也为没离开‘敌人’的圈儿”，原因就在每次运动我都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卷入了派系斗争（或家族宗派，或党内派别）的漩涡里，形成了一个无以逃脱的“怪圈”。这其实是最能显示中国式的运动（阶级斗争）的实质的：无论是打着什么样的“革命”旗号，一旦落实到基层，就一定变成单位内部的与复杂的人事关系纠缠在一起的派系斗争，权力斗争。这就是“用尽精力相互伤害”的“窝里斗”，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这是中国国民性的特点，也是中国的传统。从古代宫廷内争，到现代政党内斗，到建国后历次运动的相互残杀，都是如此。这位深受其害的回忆者，因此说：“文革进行了两千年”。[41] 这是一个极深刻的命题：所谓文革全民“革命”，就是全民“窝里斗”，依然没有走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历史怪圈：既是“政治怪圈”，更是“文化怪圈”。

在许多人的回忆里，都谈到了这样的窝里斗。《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里就谈到，“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新建学校，老师们来的时候就分为三派势力：进修学校的，工业学校的，师范大学的，各地来的领导。来一个领导带一拨人”。红卫兵造反，学生一闹，“好像扔了一个炸药包，他们（老师和领导）互相干上了。他们相互知底细，愈闹愈大，愈升级”。我现在认识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文革，实际就是“学生的革命跟老师宗派的派性斗争，搅在一块”，“我们就成了人家利用的工具，可又身不由己”。[42]

某工厂生产股的一个干部也有这样的回忆：因为在生产股管生产，刚打学校出来。干事认死铆，得罪了许多人，“这就种上了祸根”。“文革一开始，这帮子恨我的人，就找我碴儿”。正好我自己不小心把毛主席语录写反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叫我写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弄成了“现行反革命”。“马上我就给揪出来，大会小会斗，天天挨揍。打我那帮人都是本厂平时刁钻耍滑的工人。平时不干活，这会儿反

有活干了，随便打人”，“打我这些人有的是临时工，想借着‘革命’闹一通转正；有的在车间干活，为的是不再当工人，到科室当干部。没有个人的目的，就这么干法，我才不信呢。文化大革命无非给大伙一个机会，各奔各的目的挣罢了。一帮人往上挣，就得有一帮子人垫背，我算是其中一个垫背的”。“他们整我，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那革委会的主任想拉起一帮支持他的人。我管生产算有实权的，他们想把我弄下去，叫他的人掌权。说我反革命，说我歪曲毛主席语录不过是个借口。干掉一拨人就能换一个班子。好多单位都是这样，人一换，结成死党，再变就很难了。为嘛历次运动整人的总在上边，有根呗。上边有人下边也有人。只要他今天不犯法，你拿他没词，干气，没辙”。这样的上下勾连的“结成死党”的关系网，是真正操纵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是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的的组织基础，“‘四人帮’离老百姓远着呢，实实在在害人的，还是各地方各单位这一帮人。”[43]

还有一位某市文化局下属戏校的中层干部，1956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自称“早就被撕得粉碎的人”，但始终被一个问题所困扰：1956年，他不在单位，没贴过一张大字报，没对领导提过任何意见，也就是没有任何“反动言论”，却硬生生地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极右”；在文革中也是没说任何话，没做任何事，还是被斗得死去活来。这是为什么？直到文革结束才弄得水落石出：原来是他所在的戏校校长、文化局党组成员和文化局长兼党组副书记之间有矛盾，局长担心校长这个强有力的对手和他争权，便借着反右把校长置于死地。为了加大打击力度，就把校长、副校长，连带他这个中层干部，硬捏成一个“反党集团”。按照“第一把手决定一切”的党的领导原则，局长认定的敌人没有材料也可以、而且必须定罪。他就这样不明不白、也不需要明白地当了一辈子的阶级敌人。当我终于弄明白了这一切以后，不禁叫道：“我不成了人家权力斗争的一个牺牲品吗？人只有一辈子，我这一辈子岂不是人家打架时随手抛在臭水坑里的一个石子儿？凭什么我这样惨？”[44]

一位文革前就下乡的知青在回忆中谈到农村里的四清运动，特别提到村子里的宗派关系：“整个村里就两姓：一是书记的姓，全姓孙；一是副书记的姓，全姓姜”，我就因为无意在姜姓人中批评了孙姓书记，就立刻遭到掌握实权的书记一派的残酷报复，想方设法把我赶走。[45]这是有典型意义的：不仅四清运动，农村里的文革，宗派、家族关系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很多地方农村文革运动，实际上变成了阶级斗争旗号下的宗族、家族内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本文因材料不足，不能展开论述，就算是出一个题目吧。

最后要谈到的是文革中后期的两派斗争，发生了许多惨烈的武斗。这里同样有派系斗争的强烈色彩。一位某市的某派头头“牛司令”就说得很直白：“要说我们局的两派，都有人际关系的背景。所谓观点，不过是借口。这两派以两位局领导为分界线，谁是谁的人，互相都清楚。原先不清楚，一闹就清楚了。一派是局里的老人，原先的干部班子。再一派都是后来调进来的新人，大都是政工干部，跟随一位后来调来的领导”。表面上争的是“谁更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实际争的是“跟哪位领导走”，背后就是跟着走的实际利益。一切出于宗派利益驱动，口头高喊的“关心国家大事，都是胡扯。不得不这样说罢了”。[46]

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文革“革命”，落实到学校，工厂，机关，农村，都会变成单位的派系斗争，变成“单位专政”。其实，任何一个单位内部都充满矛盾：不同领导之间的矛盾，领导与群众的矛盾，不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又是与复杂的人事关系（同学、乡亲、战友等等）纠缠在一起，构成了前文所说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在正常生活里的单位内斗是非政治性的，因而是可以调和，变动的。但到了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就要将其政治化。通常是由单位第一把手以“组织阶级队伍”为名，将听从于他的那一派人定为“左

派”即运动积极分子；而把不听从于己或自己认为有问题的群众，打成“右派”即革命对象。

而文革的特殊性又在于，毛泽东出于打乱既定秩序的需要，支持群众起来造基层党组织第一把手的反，这样，与书记有矛盾的群众就成了“革命派”（“造反派”），而追随书记的群众自然就是“保守派”。而无论“左派”与“右派”之分，还是“革命派”与“保守派”之分，都将单位原有的非政治性的内部矛盾高度政治化，变成一个吃掉一个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哪一派掌握单位的领导权。这样，在冠冕堂皇的革命口号下，实行的是权力的再分配。这关系着每一个人实际利益：掌权派就拥有一切，不掌权的就成为专政的对象。这样的权力斗争就必然是你死我活，空前残酷的。最终导致了单位内群众和干部的大分裂，大厮杀，把中国传统的“窝里斗”推到了极致。

（六）“个人有个人的活法”

当然，对造神与杀戮的全民性，也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任何时候都会有不同于主流的个人别的选择。就像一位回忆者所说，“文革就是那个样子，但个人也有个人的活法”。[47]

一位红卫兵就谈到他如何“走出疯狂”成为“逃避文革的逍遥派”的。他首先承认，“文革可不是那么容易拒绝的。那不是由于它的威力，而是它的诱惑力，文革真是壮丽迷人的呀”，当年的红卫兵就是被革命的盛大节日所吸引，在伟大领袖的指挥下，进行革命的“圣战”的。但他们很快就从中嗅到了血腥味。这位红卫兵谈到一次抄家，一个伙伴朝着房主（据说是一个资本家）一棒打去，“‘啪’地打在嘴巴上，就看他一口血吐出来，跟着吐出许多牙来，这感觉非常可怕！我呆住了”，“完事离开时，我和那男人目光正好相碰，他张着那没有牙的血嘴，像脸上一个血糊糊的洞；他的目光怔怔的，没有内容，却很专注，好像要记住我似的。我不由自主地刷地躲开这目光，如同犯了罪那样，尽快逃离了这个家”。“我无法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革命对象’”，“从良心、从心灵中很深很深的地方感到我无法这样做下去”，“这便不知不觉离开革命的‘金光大道’，走向逍遥的一边”。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他还这样对人说：“我为什么当上逍遥派，说明白点儿，就是因为我心软，害怕相互残杀，害怕流血流泪。如果说我这么做是经过多么深刻的思考，那是骗您。在那个时代，没有几个人能够独立思考，能像今天这样明白。何况那个时代还充满了诱惑！只能说这是凭一种本性，也就是说文革逍遥派大多数是一些心地善良的人”。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宁静和心安理得。[48]——这是有相当代表性的：文革中后期人们纷纷退出或远离革命，成为逍遥派。而他谈到退出的原因是“凭一种本性”，则既符合事实，更有一种深刻性：从根本说文革是违背人性的，因此，只要人的善良本性尚存，人们终会摆脱文革的诱惑，与之保持距离。这是发动者无法左右的。

另一位某市农科院的科研人员在整个文革过程中，都坚持“不做罪人，也不做红人”的原则，“在夹缝里求生存”，居然逃过了“整人，或被人整”的劫难。他的办法是仗着自己出身好，没有辫子，尽量躲到农村去试验和推广农民需要的除草剂，每回院里叫去开会，就请公社或县里出面请假，他就在农村的政治保护伞下，“既躲过运动又干了业务”。但他自己却毫无幸运之感，反而自称“没有情节的人”，他说：“一个想为国家做事的知识分子，被迫琢磨出这样一条路来有多可悲！我必须扭曲自己，必须装傻，装无能、装糊涂，叫人看不上我，对我没兴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没情节，就是没高潮，没起伏，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生活很乏味，很压抑。有时觉得没有自己，好像自己被一种强有力的东西消化了。事业成功了，自己却消失了。这是一种很深刻的内心的苦味。但只有这样，你才能把事情干下去，否则就会被卷进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这位科技人员靠着中国传统的“难得糊涂”的智慧，在夹缝里求得生存，不仅成

功避害还保持了自身的干净，也有一定代表性。但他对这样做的代价的反思，对“很深刻的内心的苦味”的正视与揭示，或许更能给我们以震撼，更引发深思。〔49〕

另一位商店的店员这样谈到他在文革中“苦中作乐”的经历和经验：“文革时，人家说所有的人都是愈斗愈瘦，唯有我愈斗愈胖，精饱神足，满面红光。记得当时管牛棚的老K问我用哪股子反动精神支撑着。我说我这是血压高，血往上冲，脸色就红，这叫回光返照。他一听，放心了”。“中国的事，一是别太认真，二是善于周旋，不能硬顶，硬碰硬，准吃亏。要像炼太极拳那样，硬来软接，或者不接，一转身，顺手送走。毛主席不是还有十六个字吗，叫作‘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我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你来硬的，我来软的；你来明的，我来暗的；你穷追猛打，我蔫损找乐，不管胜负，我心里舒服就行”。他举了一个例子：关在牛棚时，“我当棚长。每天早晨召集那些‘牛’开会时，我故意等着老K到场，突然‘啪’地一拍桌子，大声说，‘今天，我们这一屋子混蛋王八蛋……’，这当然把老K也骂在里边了。一天，老K好像醒过点味儿来，瞪着眼问我，我离开装得很冤枉地说：‘您没听我说‘我们这一屋子’吗，‘我们’是指牛鬼蛇神，哪能是您呢！’老K没词了，从此天天乖乖地挨我一次骂。您说这好玩吧。可要不这么找乐，只能犯愁、苦闷、掉泪、上吊自杀。我们棚里死了一个小资本家，他心里搁不住事儿，受不了，打二楼窗户脑袋朝下跳下来。我心想，你呀，傻瓜！人家不叫你活，你也不叫自己活？”〔50〕——捉弄老K的事，或许有点阿Q精神；但许多人确实是通过“苦中作乐”熬过了文革最残酷、也最荒唐的岁月的。这也是一种“中国智慧”吧。

还有人在文革中给自己规定了两条：“做奴隶，不做奴才”。前者是自己无可逃脱的命运，后者是自己的选择。“做奴隶是被迫的。我刚被关进牛棚的时候，经常给弄到街上游斗。开始我很怕给熟人看见，怕难看，后来没有这种担心了。我就像奴隶时代的奴隶。奴隶的工作是两种。一种是劳役，一种好比马戏的猴子，供人玩耍。反抗是无效的，只有听之任之”。“但我决不做奴才”，“决不会逢迎、谄媚、讨好、告密、出卖别人。被屈辱不可耻，但奴才是可耻的”。〔51〕——“不做奴才”，这是一个人性的选择，是坚守“人之为人”的底线。在文革中是对每个人的严峻考验。当许多人在威逼与诱惑下都争先为奴，并从中捞取利益的时候，做到不逢迎、不出卖，就特别难能可贵。

当然，也还有清醒的“旁观者”。一位1957年的右派，谈到他和从大学下来的右派朋友从文革一开始，就看透了一切，“绝不信那一套假马列主义”，并给文革定了性：这是“希特勒式的法西斯犯罪”；同时也清楚自己无力阻挡，就采取“冷眼审视”的态度。一方面，“采用各种狡猾的方式周旋，检讨，装孙子，逃避监督”，目的是保全自己，等待来日；另一面，“不敢言而敢怒”，寻机反抗，“以信仰真理的坚强意志来维护花岗岩脑袋”。〔52〕而且更有自觉无畏的思想的批判者与行动的反抗者。为此而献身的，也大有人在。对这些文革中的“中国的脊梁和筋骨”，我们另有专门的讨论。

（七）伟大的女性

最后还要谈谈在文革中成为许多人度过磨难的精神支柱：那些伟大的女性。

本文多次引述的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选择《拾纸救夫》一文作首篇，自然是大有深意。文章说的是一位鲁西南某县公社小学的语文老师，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人揭发他在学生中讲了一个“毛主席当年在湖南浏阳被白军追得趴在田间水沟藏身”的故事，对毛主席无限崇拜的革命群众立刻断定这是“赤裸裸污蔑毛主席”，就以“特大反革命案”将其逮捕入狱。这位老师辩解说，这是从书上看来的，但又说不出具体书名，这就更加上一个“故意编造”的罪名，在文革中被判八年徒刑。他老婆是个乡下女人，刚结婚一

年多，有六个月的身孕，听说后，就到县里喊冤叫屈。县领导说：“你去找，只要找到出处，我们就放人”。“乡下女人心实，把这话揣在肚子里，就四处找开了”。先到书店、图书馆找，找不到书，就拾印字的纸，从纸上找。“她不识字，拾到纸便请亲友或小学生给她念，听听有没有那故事”。“有人劝她：‘你靠拣纸，哪能拣到那故事？你又不识字，天底下那么多带字的纸，你哪能都拾来？’可谁也说不动这女人，她依然天天提个破篮子在街上拾。只要发现一块带字的纸，就若获至宝”。“孩子小时，她背着孩子拾；孩子大了，她带着孩子拾”，“一年到头，春夏秋冬，雨雪风寒，从没有停止过一天。她整整拾了七八年纸。”“可是，在她爷们儿刑满前半年的一天夜里，灶膛里的火，引着了堆满屋角的废纸，着了大火。这女人和孩子活活烧死了”。直到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在有关部门努力下，终于找到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一书，其中收入了谢觉哉写的《浏阳遇险》。[53]在真相大白以后，人们这才认识到这位“拾纸救夫”的农村女人的不易和价值：她虽不识字，但始终坚守两个信念：自己的丈夫是清白的，真相总有澄清的一天。她以自己的坚定信念支撑自己，更支撑了她蒙冤受难的丈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文革这样的灾难面前，人们最需要的也就是这样的信念的精神支撑。而提供支撑的，往往是女性：母亲和妻子。他们看似柔弱，但却具有坚韧的生命力量，在关键时刻就挺身而出。这是一种危难之中的伟大，平凡的伟大。

还有一篇孩子对母亲的回忆，永远难忘的是文革中母亲的三次微笑。文革一开始，作为全省闻名的评剧演员，母亲就被揪了出来，每天轮番批斗。到了夜晚，我们都默默站在门前，惊恐不安地等待母亲的归来，而疲惫不堪的母亲一看见我们，那张被欺侮的脸瞬间恢复我们熟识的笑容，我们顿时就放下心来。1970年春节前，母亲突然被勒令到三四百里的公社劳动改造。那个雪后的清晨，我们去火车站送别，母亲依然露出“那朝阳一般的微笑”。半年后，我们父子三人赶去和母亲、妹妹团聚。在村口见到母亲那一身补丁的破工装时，内心充满了不可言状的辛酸感觉，而母亲依旧微笑。她的坦诚微笑也赢得全村农民的信任与尊重，我们全家人也在保留着善良天性的乡亲这里获得了庇护。“母亲的微笑就深深地印在了我那段痛苦的记忆中，这微笑是黑暗里的一丝光亮，使年幼的我得到安慰和温暖，这微笑伴随我走过苦难，这微笑使我长大成人后能面对世间的一切困苦磨难”。[54]——“母亲的微笑”是一个象征，内蓄着爱与信念的坚韧的生命力量，邪恶可以猖狂于一时，最终胜利者还是母亲的爱，人的本性。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